



融通中西 · 翻译研究论丛



△ 域外小說集

《域外小说集》的 生成与接受

Formation and Reception of
A Collection of Foreign Novels



■ 叶依群 著 By Ye Yiqun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融通中西 · 翻译研究论丛

《域外小说集》的 生成与接受

Formation and Reception of
A Collection of Foreign Novels



■ 叶依群 著 By Ye Yiqun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域外小说集》的生成与接受 / 叶依群著.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8.5

ISBN 978-7-308-18078-8

I. ①域… II. ①叶… III. ①鲁迅(1881—1936)—
文学翻译—研究 ②周作人(1885—1967)—文学翻译—研究
IV. ①I210.96 ②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55358 号

《域外小说集》的生成与接受

叶依群 著

责任编辑	包灵灵
责任校对	杨利军 吴水燕
封面设计	城色设计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杭州中大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4.5
字 数	260 千
版 印 次	2018 年 5 月第 1 版 201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8078-8
定 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联系方式: 0571-88925591; <http://zjdxcb.tmall.com>



叶依群 女，1963年生，浙江科技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本科毕业于杭州大学英语语言文学专业，在浙江大学教育学院比较教育专业获硕士学位。现从事大学英语和英语翻译课程教学，主要研究方向为比较教育和文学翻译。在国内外刊物发表论文30余篇；出版专著2部（第二主编）；主编翻译教材2部，听力教材1部；主持或参与多项教育部和省、厅级项目；主持的项目曾先后2次获浙江科技学院教学成果奖。

本书获2017年浙江科技学院学术著作出版专项资助



前言

文学翻译,不管是研究鲁迅还是研究周作人,《域外小说集》都是绕不过去的研究对象。在周氏兄弟的所有译作中,最受学界关注、评价最高的是当时销售最差的《域外小说集》。尽管《域外小说集》并不成功,但学界高度评价其在中国翻译史上的地位,并肯定其对中国现代文学翻译发展方向和未来主流翻译规范建构的重要意义。

晚清中国社会和文化呈现出多元格局,翻译受到了普遍关注,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域外小说集》正是在晚清翻译大背景下生成的。1909年,鲁迅和其弟周作人在日本留学期间,合作编选、翻译、出版了这部短篇小说集(分一、二册),收录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7个国家10位作家的16篇作品(其中15篇小说,1篇童话),有俄国契诃夫、迦尔洵、安特莱夫,英国王尔德,法国莫泊桑等名家,特别注重介绍北欧、东欧等国家和地区反映人民苦难和民族解放运动的作品,是我国译介外国短篇小说的开山之作。《域外小说集》一反清末译坛的意译风气,忠实地保留了原作的内容、文采及章节格式,开了近代文言直译小说之先河。然而,销售却异常惨淡,在当时没有引起任何注意和反响,甚至是大为失败的。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域外小说集》逐渐显示出其学术价值。中国现代翻译史上,还没有一部译作会引发学界长达一个多世纪的研究。随着史料的挖掘和补充,不断有学者提出新的观点,相左的意见也不少,《域外小说集》也随时代的变迁经历了各种各样的阐释和解读。尽管与此相关的研究论文不少,但就笔者所知,目前学界还没有对《域外小说集》进行全面探讨的专著出版,因而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

《域外小说集》在中国翻译文学史上有着很重要的地位,正因如此,一个多世纪来,学界的研究经久不衰。《域外小说集》体现了周氏兄弟人道主义和启蒙主义的文学理念,译介目的除重视思想教育意义外,还注重学习外国文

学的艺术技巧。翻译《域外小说集》就是为了使“异域文术新宗，自此始入华土。”同时特地介绍短篇小说，旨在冲破中国章回小说的樊篱，以短篇小说这一形式改造中国的小说，这不得不说是一种新的文学眼光。在翻译上提倡直译，是为了纠正林纾等人任意删节的毛病，也是为了忠实地介绍外国文学。以“弗失文情”为翻译标准，提倡忠实于原作的直译，于“信、达、雅”三者，尤其突出“信”字。从一开始，文学翻译活动就有自己明确的宗旨和目的性，译介的作品在选材上很审慎，有助于开启民智和救国新民。“弱小民族”的翻译路径，是周氏兄弟的刻意选择。

《域外小说集》以译者的审美趣味决定一切，全然不求取悦于人，这在周氏兄弟的翻译生涯中，乃至在整个中国翻译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正如该书序言所说：“《域外小说集》为书，词致朴讷，不足方近世名人译本。特收录至审慎，迻译亦期弗失文情。”从此二人彻底与林纾的译介方式告别，坚守自己的翻译理念和翻译风格，《域外小说集》的出版标志着周氏兄弟翻译活动的转向。广泛的阅读加深了周氏兄弟对文学的理解和认识，其翻译目的从“启智”转到了“移情”，因此他们的译作完全背离了当时主流翻译规范认可的翻译目的，《域外小说集》不论是选材、翻译目的还是译法，都标新立异。

对《域外小说集》的评价，学界历来有不同的意见，甚至截然相反的看法，这吸引了笔者。多年来，笔者一直查阅研读资料、反复探究，不断追寻，把其中与《域外小说集》译介相关的文章作了记录、整理和归类，并写了读书笔记。五六年的时间，积累了很多资料，也写过一些心得，在期刊上先后发表了4篇研究论文。虽然学识浅薄，学术水平有限，但对周氏兄弟及《域外小说集》的感情已是相当深厚。对学术的追求令我鼓起勇气，勉力将对这部历经百年的译作研究编写出来。

通过考察晚清社会历史文化背景，梳理《域外小说集》译介过程中的译者选择及其因素，本书的目的不是简单地重复《域外小说集》研究已有的结论，而是关注一些结论背后的问题：如周氏兄弟早期译介活动对《域外小说集》翻译的影响；哪些因素影响他们的选择？他们的合作是一种怎样的翻译方式？《域外小说集》翻译文本有着怎样的学术特征和超前性？读者接受失败背后的复杂因素……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探索和解答，本书试图证明：评论一部翻译作品，不能囿于文字或读者接受情况的判断，而要考虑译入语文化对翻译活动的制约和需求，更要考量译者在翻译规范下的选择，否则，任何结论都有可能失之偏颇。笔者希望通过对《域外小说集》系统全面的研究，从更宏观的视角去描述和理解翻译活动，展现《域外小说集》译介中体现的译者主体性、译本对五四新文学的影

响等,梳理学界在不同历史时期对《域外小说集》的不同评价。

在研究方法上,本书首先运用文献法,结合文献资料对个案进行社会的、语言的和文化的阐释;其次,运用文本分析法,对比源语文本和译语文本,分析在异化的翻译策略下对异质文化的保留,但由于《域外小说集》中不少作品是从第三种语言转译,文本研究只能局限于少数译本的文本分析;第三,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的方法,将本课题置于晚清的历史语境,采取宏观的研究视角,依然属于微观的研究,但就考察《域外小说集》个案而言,则又做到了宏观的分析。

全书共分十章,对《域外小说集》的译介和接受进行深入的探讨和研究。

第一章 绪论——作为翻译家的周氏兄弟:本章首先从周氏兄弟的翻译家身份切入。他们的创作身份为人熟知,但周氏兄弟同时还是一个翻译家,他们的文学生涯始于翻译,终于翻译。学界对周氏兄弟翻译作品研究最多的就是《域外小说集》,从一个多世纪前出版时引发晚清学人的不同评价,到21世纪的今天,这部译作依然是周氏兄弟翻译研究的热点。本章主要探讨周氏兄弟作为翻译家的文学活动轨迹。从故乡绍兴到南京求学,他们开始接触宣传维新思想的新书刊,阅读各种新学书籍。东渡日本留学后,开始了青年时代的第二次追求。为改变国民精神,鲁迅带领弟弟作人,走上文学翻译的道路,并矢志不渝,一生追求。本章通过对周氏兄弟“赴异乡、走异路”的人生轨迹的回顾,重在探讨他们的心路历程,为后面的研究做好铺垫,同时对鲁迅翻译作品研究概况进行了一个简单的概述。特别强调,研究者应该从宏观的角度对构成鲁迅翻译整体的各个部分作社会的、文化的,或是语言的阐释,以发现各部分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制约。

第二章 《域外小说集》研究概述:研究《域外小说集》,首先要对学界以往的研究状况有一个全面深入的了解。基于前期收集的研究资料所做的文献综述,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文学史意义及对译介的影响;译介研究褒贬不一;读者接受失败原因的不同解读等。明确学界研究的重点和问题所在,发现研究中有争议的问题,如:周作人在译介中的作用;学界对作品选材方面的争议;《域外小说集》的文学史评价为什么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会有差异;对直译方法的不同看法等,确定本书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第三章 晚清文学翻译的背景和特点:本章对清末民初文学翻译(主要是小说)的背景和特点进行梳理,有助于客观地描述晚清社会文化背景下周氏兄弟的翻译活动及《域外小说集》的生成语境。本章主要讨论在清末民初翻译文学繁荣的背景下,翻译文学作品数量的大幅增加以及品种和题材的拓展,对域外小说译介的目的、类型和特点、译介方式等进行探究。在晚清小说规范面前,译者是如何应对的,译者因不同的诉求而做出的不同的选择,并采



用不同的言说方式,因而也就产生了不同的结果,由此了解他们当时所面对的复杂的社会、文化和文学规范,了解他们在翻译活动中如何配合和抗衡这些规范,并由此理解他们为了在新与旧、中与西的巨大鸿沟之间搭设起沟通的桥梁所做的努力,有助于阐释周氏兄弟独辟蹊径的译介路径。

第四章 周氏兄弟早期的文学活动:《域外小说集》是周氏兄弟在日本留学期间的合作成果,因此,他们在1903—1909年间的文学活动,即以《域外小说集》的出版为界,是需要重点考察的。从科学救国梦的追求,从“意译”向“直译”的转化,标志着周氏兄弟翻译路径的改变。了解他们在翻译领域的探索与准备,是深入研究《域外小说集》所必需的。本章将讨论鲁迅和周作人早年的求学生涯及他们是如何走上文学的道路,梳理他们年青时期的人生轨迹。从南京到日本东京,兄弟二人阅读进步期刊和书籍;筹办文艺杂志;听太炎先生讲学;从事翻译活动等。可以说,《域外小说集》的出版,离不开他们在文学活动中积累下的丰富经验。因此,这一章将尽量还原周氏兄弟早年的人生轨迹,探讨洋务派和维新派思想,以及晚清社会文化对他们早期翻译作品的影响,对他们的文学活动有一个清晰的梳理和把握。

第五章 《域外小说集》的译介准备:1909年3月和7月出版的《域外小说集》一、二册,并不是横空出世的,其中有着周氏兄弟大量的前期准备工作,而学界缺乏这方面的相关研究。事实上,根据史料,周氏兄弟为此准备了三年多的时间。通过对周氏兄弟在日本留学期间(主要是1906—1909年)活动的考察,根据相关文献和史料的梳理,可以归纳出周氏兄弟为《域外小说集》的出版主要进行了三方面的准备:一是语言(外语)学习和域外文学的阅读;二是兄弟合作及翻译实践;三是为文艺杂志《新生》所做的创作和翻译。在外语学习方面,当时鲁迅已经从仙台医专退学,决计从事文学活动,周作人也到了东京留学。他们学习了日语、英语、俄语、德语和希腊语等,通过这些外语阅读外国文学作品,广泛摄取异域文学作品和西方文论思想的结晶,由此具备了一定的外国文学知识,更重要的是他们自己能够阅读,能够在纷杂的翻译作品中选择符合译介目标的材料,并进行了翻译实践。期间他们撰写论文,为筹备中的杂志《新生》或单独,或合作翻译了一些作品,《域外小说集》中的翻译理念,在这个时候已经产生。鲁迅看似蛰伏的三年,实际上做了充分的准备。

第六章 周氏兄弟在《域外小说集》中的译介合作:本章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论述:首先在合作的译介方式一节,对以往研究中周作人在译介中的作用问题进行深入考察,重点突出他们在译介中的分工与合作,明确《域外小说集》是周氏兄弟的合作成果;鲁迅领着弟弟译书,主要负责书稿的修改、誊写、

出版、印刷等事宜,而主要翻译工作是由周作人完成的,因此这本书是周氏兄弟的共同作品。其次再现周氏兄弟是如何一起搜寻那些来自偏僻国度的作品,并在翻译合作上默契配合的,说明周氏兄弟在对抗晚清主流的翻译规范,尝试译介弱小民族国家文学的路径上共同做出的努力。

第七章 《域外小说集》的出版与销售:这一章主要从封面设计、印刷与发行、资助人、销售情况、出版报道与赠书几个方面进行阐述。这是周氏兄弟自己译介出版的第一部译著,与出版相关的工作鲁迅都亲力亲为,从中看出鲁迅对待译介工作的严肃认真。书的出版不得不提周氏兄弟的资助人蒋抑卮先生。对周氏兄弟将译作结集出版的想法,他特别支持。正是有了他的慷慨借款,《域外小说集》才最终得以出版。通过史料,就东京某杂志对《域外小说集》的出版报道进行分析,为什么当时籍籍无名的周氏兄弟和他们的《域外小说集》,会引起他们的注意,而这也是媒体最早的相关报道。通过报上的赠书致谢这一史实,我们可以知道《域外小说集》的传播超出学界一直认为的41册的销售数字。这一章主要通过文献和史料还原当时的出版和销售情况,并对学界有疑问之处进行考证。

第八章 《域外小说集》译介研究:这部分是全书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学界研究较多的课题。首先在晚清翻译文学的背景下,围绕译介目的、选材、文类、译介方式、翻译语言等展开讨论,周氏兄弟选择的多是俄国、波兰和北欧一些国家的反映民族解放运动和人民疾苦的作品,并针对俄国作品选目进行了分析。学界有人认为俄罗斯作品算不得“弱小民族”的文学,通过引用周氏兄弟当时的解释和说明,明确他们着眼的是苦难的民众,而当时俄国人民在帝国主义奴役下,符合他们的选择标准:“对社会有借鉴作用”,“于读者有益”。为了信、达,保持作品的原貌,强调忠实于原作,明确提出“任情删易,即为不诚”,除直译外,还运用了古奥的语言,导致译文“佶屈聱牙”;并将当时读者还不太熟悉的短篇小说文类介绍到中国,所选的作品都是侧重主观表现的、以诗化的意境与语言来表达个体生命的抒情化短篇小说,体现的是对心灵世界的关注。分析《域外小说集》译介中的各种因素,今天以现代的眼光再来看时,不能不惊叹《域外小说集》在选目、译介方式等方面所体现的难以比拟的超前性。在晚清新旧文学嬗变、中西文化交融的时代,从上述研究中可以窥探周氏兄弟在文化方面的自觉性和自主性。

第九章 《域外小说集》的学术特征与学界评价:除突破除弱小民族文学作品选材和直译的方式外,周氏兄弟还在《域外小说集·略例》中对人名、地名的翻译方法、标点符号的使用及装订等做了详细的说明,在卷末杂识中对作者进行了介绍。这些翻译内容之外的规范,尤其是和翻译没有直接关系的装订

等,与当时晚清的翻译规范比较,明显不一样,可以说,《域外小说集》的译介,已经具有了今天我们所说的学术特征。周氏兄弟费尽心思,在晚清意译风尚中独树一帜。这部分内容在以往研究中涉及的不多,或者探讨浅尝辄止,没有进行深入地挖掘。就不同时期学界的评价,本章节也进行了归纳分析。

第十章 《域外小说集》读者接受的多视角阐释:《域外小说集》两册区区41本的销售记录屡屡为人所提及,承载周氏兄弟远大抱负的《域外小说集》自然没有能产生什么大的影响,也可以说是空前的失败,成为周氏兄弟译著发行量最少的一部,其文学价值几乎没有实现。关于读者缺失的原因,鲁迅自己已有解释,多年来,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学界也多有阐发。综合学界的观点,通过对《域外小说集》的接受的相关文献进行归纳分析,然后从读者期待视野进行解读,笔者提出了自己的思考:读者缺失的原因是翻译文本超越了读者的期待视野;文学形式超出了读者的接受能力;直译的方法不符合流行的意译风尚;复古的语体影响了读者的接受等。

《域外小说集》的译介,充分体现了周氏兄弟的翻译观念和审美趣味,没有像侦探小说那样畅销,是因为其在选材、文学形式、翻译手法和翻译语体等方面与当时一般读者的阅读经验不合,缺乏本土文学经验和接受土壤。周氏兄弟的译作缺乏广大的读者群,传播面极窄,没有达到预想的启蒙作用,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但是,对周氏兄弟《域外小说集》译介的研究,并没有湮没无闻,历经一个多世纪,学界一直在不断地探索,尤其是进入21世纪,《域外小说集》的影响也越来越广。学界高度评价其在中国翻译史上的地位,肯定其对中国现代文学翻译发展方向和未来主流翻译规范建构的重要意义。2009年11月,由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俄罗斯语言文学系、俄罗斯文化研究所主办,上海鲁迅纪念馆、北京大学欧美文学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当代俄罗斯研究中心和北京大学出版社协办的“俄国文学的传播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建构”——纪念果戈里诞辰200周年、鲁迅《域外小说集》出版1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大学召开,充分说明了《域外小说集》跨越百年时空后仍具有学术研究价值。本书通过对《域外小说集》的生成与接受展开研究,梳理周氏兄弟早年的文学活动轨迹,将散落在期刊文章与著作中的点点滴滴收集起来,结合现有的文献和史料,解读这部百年译作,内容或许还很单薄,但也算是为《域外小说集》的研究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吧!

叶依群

于浙江科技学院小和山校区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绪论——作为翻译家的周氏兄弟	1
第一节 南京求学	2
第二节 东渡日本留学	5
第三节 翻译家鲁迅	7
第四节 翻译家周作人	10
第五节 鲁迅翻译作品研究现状	12
第二章 《域外小说集》研究概述	16
第一节 文学史意义及对译界的影响研究	17
第二节 褒贬不一的译介研究	18
第三节 读者接受失败原因探究	19
第四节 《域外小说集》研究中的问题	21
第三章 晚清文学翻译的背景和特点	24
第一节 晚清文学翻译的背景——开启民智	24
第二节 翻译小说的类型和特点	28
第三节 翻译方式——以意译和译述为主	32
第四章 周氏兄弟早期的文学活动	36
第一节 研读进步书刊和作品	37
第二节 筹办文艺杂志	40
第三节 从太炎先生学	44
第四节 从事翻译活动	47

第五章 《域外小说集》的译介准备	54
第一节 周氏兄弟的外语学习	54
第二节 兄弟合作翻译	58
第三节 “《新生》甲篇”和“《新生》乙篇”	62
第六章 周氏兄弟在《域外小说集》中的译介合作	66
第一节 合作的译介方式	67
第二节 原作的搜寻与筛选	70
第三节 废寝忘食的译者形象	73
第七章 《域外小说集》的出版与销售	76
第一节 《域外小说集》的装帧和封面设计	76
第二节 《域外小说集》的印刷与发行	78
第三节 出版资助人蒋抑卮	79
第四节 《域外小说集》的销售	82
第五节 《域外小说集》的出版报道、推介广告及赠书	83
第六节 1921年《域外小说集》重印版	85
第七节 《域外小说集》的版本及初版本存世数量	87
第八章 《域外小说集》译介研究	92
第一节 《域外小说集》作品概述	92
第二节 《域外小说集》译介目的——转移性情 改良社会 ...	105
第三节 《域外小说集》的选材——开创“弱小民族文学”的 译介路径	112
第四节 翻译方法——“异化”的直译策略	124
第五节 翻译文类——缺乏故事情节的短篇小说	142
第六节 翻译语言——古奥的文言	147
第九章 《域外小说集》的学术特征与学界评价	161
第一节 《域外小说集》译介的学术特征	161
第二节 学界对《域外小说集》的评价	172
第十章 《域外小说集》读者接受的多视角阐释	181
第一节 读者接受——学界的探索	182
第二节 读者期待视野下的解读	187
参考文献	200
附 录	211
索 引	216
结 语	220

第一章

绪论——作为翻译家的周氏兄弟

鲁迅(1881—1936)和周作人(1885—1967)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是两个颇有分量的名字。他们都是跨越晚清和民国文坛的著名翻译家,给后人留下了大量的文字,在清末文坛和新文化运动初期享有崇高的威望。在此期间,他俩携手从事翻译活动,其成就相映生辉,颇得后人赞赏,是清末介绍和翻译欧洲新文艺的先驱。鲁迅身后留下的1000多万字的作品,其中翻译作品达300多万字;周作人一生著译逾1100万字,翻译约占去一半。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能像他们那样兼事著译并取得如此成就者恐怕是屈指可数的。在中国现代思想史和文学史上,他们更多地呈现为一个整体,被称为“周氏兄弟”而同享盛誉^①。五四以后,当时许多显赫的文人渐渐被人遗忘,惟其兄弟二人,却一直矗立在20世纪文化的中心点上,成为两处绕不过去的存在^②。然兄弟俩性格迥异,最终选择了不同的方向,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

1881年9月,鲁迅出生于浙江绍兴一个破落的封建家庭,原名樟寿,字豫才。1898年,鲁迅到南京求学时改名周树人,源于“百年树人”的典故。1918年5月,鲁迅38岁时,首次用“鲁迅”的笔名,发表了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着重大影响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奠定了新文学运动的基石,后来人们习惯称之为鲁迅^③。除广为人知的笔名“鲁迅”外,他还用过庚辰、索士、巴

① 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69页。

② 孙郁:《鲁迅与周作人》,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页。

③ 《新青年》主编陈独秀、胡适等人不赞成匿名或用别号,定有一个清规:必须使用真姓名。鲁迅不想破坏这个规矩,用了“鲁迅”这个笔名,后来差不多成为他的本名。参见周作人著,止庵校订,周作人自编文集《鲁迅的青年时代》,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5页。

人等笔名,多达128个。鲁迅出生时,周氏家族的黄金时代已经结束,但还没有完全破落。鲁迅刚满7岁,被送进私塾启蒙读书,12岁进入绍兴城内最严苛的私塾三味书屋,就学于方正博学的寿镜吾老先生,先后读完了《四书》《五经》《唐诗三百首》等书。在祖父的指点下,他从七八岁开始先后阅读了《西游记》《水浒传》等小说,也阅读过《诗经》《楚辞》及陶潜、李白、李贺、李商隐、温庭筠、苏轼、陆游、黄庭坚等人的诗。鲁迅非常好学,在三味书屋读书时,在博学的寿先生指教下,还读了《尔雅》——中国最古的文字训诂书。到17岁离开家乡之时,鲁迅已经博览了中国的许多古籍,包括一般士大夫读的《论语》《孟子》及儒家经典,此外,他还涉猎过许多笔记和野史。厚实的旧学底子和对传统文化的了解,为其日后从事翻译和创作奠定了稳固的基石。

1893年,鲁迅13岁,家里发生了一场很大的变故,鲁迅祖父因科场案被关进监狱,家里经济状况渐入困顿。雪上加霜的是,父亲又得了重病,家境无可挽回地破落了。作为长子的鲁迅不得不挑起了全家的重担,心灵饱含苦痛,也饱尝了冷眼和侮蔑的滋味,这些经历促使鲁迅做出决定:不走应试科举的寻常路,而是离开家乡,走别的道路,寻找别样的人们。

周作人是鲁迅的二弟,现代著名散文家、翻译家、思想家,出生于1885年,比鲁迅小4岁。原名樵寿,又名启明、启孟、起孟,笔名遐寿、仲密、岂明、开明、苦茶庵,号知堂、药堂、独应等。因鲁迅名“树人”,弟弟因之取名“作人”。周作人6岁入私塾,11岁时进三味书屋,接受传统的汉学教育。故乡地处江南水乡,经济较其他地方发达,交通便利,各种信息传播得比较快。小小年纪,周作人便开始关注外面的世界。在大家庭一天天败落之际,沉闷的生活让周作人做出了和其兄长鲁迅一样的决定,即“走异路”,跟随鲁迅的选择,离开家乡去南京洋学堂求学。

第一节 南京求学

1898年,鲁迅17岁,离开故乡进入南京江南水师学堂学习洋务。江南水师学堂创建于1890年,是中国洋务派为恢复甲午海战后的中国海军实力所做的一项努力。然而,当时洋务学堂的名声不太好,书生当兵也不光彩,但以鲁迅当时的家庭情况,他别无选择。他在《〈呐喊〉自序》里介绍了那时的境况:

我要到N进K学堂去了,仿佛是想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我的母亲没有法,办了八元的川资,说是由我的自便;然而伊哭了,

这正是情理中的事,因为那时读书应试是正路,所谓学洋务,社会上便以为是一种走投无路的人,只得将灵魂卖给鬼子,要加倍的奚落而且排斥的,而况伊又看不见自己的儿子了。然而我也顾不得这些事,终于到N去进了K学堂了。^①

年轻的鲁迅满怀人生新的希望,开始了异地的追寻。正是这次出行,开启了鲁迅的人生之路,在南京求学时他的自我意识和价值观渐渐形成。但进了学堂,鲁迅便发现所学内容名不符实:一星期有4天的英语课,缺乏专业实习课;学堂也没有上进的气息。这个被他寄予无限希望的地方,和家乡没什么两样。鲁迅对学堂的“乌烟瘴气”和落后保守的风气深为不满,加之教员教学水平不高,更令他无法忍受的是学堂排斥进步的思想和新生的事物。因此,鲁迅在江南水师学堂只读了一个学期,便决定离开。随后他转入同在南京的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路学堂,学习采矿。陆师学堂是清朝洋务派代表人物张之洞(1837—1909)创办的新式学校,比起江南水师学堂,鲁迅更喜欢这里的氛围,新的教材和课外新书籍,在鲁迅面前展现了一个完全未曾有过的不同的世界。鲁迅在矿路学堂整整学习了三年,掌握了一些科学知识。地质学的课本采用的是英国地质学家赖耶尔的名著《地质学纲要》,中译本为《地学浅说》,这门课对鲁迅来说是一门新的学问。鲁迅不仅学了矿物学和其他科技方面的知识,包括格致(物理和化学)、地学(地质学)、金石学(矿物学),还学了德语,阅读了一些生理学与医学的书。当时矿路学堂的总办俞明震(1860—1918)是个新党,常看些《时务报》之类的东西,学校阅览室就有宣传西学观点的新学报刊,鲁迅由此接触到了“西学”,开始了解科学与民主的思想和达尔文的进化论,充分吸取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新鲜空气。

鲁迅去南京求学三年后,1901年9月18日,周作人也结束了他在绍兴单调、枯燥、烦闷的生活,追随兄长的脚步,到了南京。不到一个月,周作人正式进入江南水师学堂,开始了他从未接触过的新知识的学习。但他对学堂的学习和生活并不满意,学校名为“新学”,骨子里却是“旧”的,唯一让他感兴趣的是英文的学习。与鲁迅愤而离开,转学路矿学堂不同,周作人却过得悠闲自在。正是在南京,兄弟俩一起阅读进步书刊,开始了对西方文化的广泛接触。1898年,戊戌变法运动失败,但由维新派所发起的思想启蒙运动并未随之终结,相反,因梁启超(1873—1929)等人将主要精力投入思想文化领域,启蒙思

① 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17页。



潮以更大的声势在神州大地兴起。当时严复(1854—1921)翻译的英格兰作家赫胥黎(1894—1963)的名著《天演论》在湖北印行。此后,严复的译作《原富》《名学》《群学肆言》《社会通论》《法意》等相继问世,系统地介绍了西方资本主义的文化思想,在当时的中国知识界风靡一时,在青年学生中也广为流传。鲁迅很早就注意到了严复的这些译著,从《天演论》《法意》《原富》和《名学》等,他表现出渴求新知识的极大热情,开始如饥似渴地阅读严复翻译的西方学术著作及各种新学书籍。严复的《天演论》不仅为他展现了一个未知的神奇世界,更成为其觉醒的“启蒙书”。

周氏兄弟在南京求学的时候,正值维新变法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之际,他们接触到大量宣传维新思想的新书刊,开始如饥似渴地阅读各种新学书籍。尽管以康有为(1856—1927)为代表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变法维新失败了,但促成了一场思想启蒙运动。中国掀起了译介外国思想文化的潮流,通过林纾(1852—1924)等人的翻译,中国人开始接触到西方的文学作品,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哲学等论著也通过严复等人的翻译进入了国人的视野,新的思想开始撞击国人的思想意识。周氏兄弟有了更多接触新思想和新学说的机会,他们阅读《时务报》《天演论》和《译学汇编》等新学书刊,广泛接触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深受维新思潮和进化论学说的影响。学堂的生产实习让他们对生活有了更多的体验,激发了他们对底层劳动人民的同情和理解,看清了社会的黑暗和变革社会的迫切性。洋务派的教育变革也为他们广泛接触外国文化、翻译外国文化提供了机缘。鲁迅开始用“嘎剑生”“戎马书生”等别号写文章,还刻了一枚“文章误我”的印章。

受维新派启蒙思想的影响,鲁迅一度热衷于政治活动。通过阅读林纾译介的英国作家哈葛德(Henry Rider Haggard, 1856—1925)的小说,鲁迅开始转向文学活动。1899年,林琴南(林纾)翻译的第一部西洋小说《巴黎茶花女遗事》出版,很快风行大江南北。鲁迅也买了这部小说,同时购得的翻译小说还有两本,一是《包探案》,系柯南·道尔所著的福尔摩斯探案故事;一是《长生术》,乃哈葛德所著神怪小说。这几本书是鲁迅最早接触的外国文学作品。由于清末翻译小说的兴盛是在1902年以后,所以鲁迅在南京的4年中,接触到外国文学作品并不多。除上面提到的三部小说外,鲁迅还阅读了几部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Jules Verne, 1828—1905)创作的科学幻想小说。1900年,凡尔纳小说的最早中译本《八十日环游世界》,深受中国读者的喜爱。当年鲁迅先后求学于南京水师学堂和路矿学堂,怀抱“科学救国”的思想和学习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知识的目的,凡尔纳的科幻小说引起了